

[美] 余英时 著

重寻胡适历程

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[美] 余英时 著

重寻胡适历程

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寻胡适历程: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/余英时著.
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4.8
ISBN 7-5633-4522-1

I. 重… II. 余… III. 胡适(1891~1962)—人物研究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925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印刷

(地址: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)
邮政编码:276017

开本:640mm×960mm 1/16

印张:8.625 字数:185 千字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 001~15 000 定价: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简介：

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个阶段，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，他的博士学位问题，他的西洋哲学素养，他对毛泽东的影响，他和蒋介石的关系……随着《胡适日记全集》的出版，其中有些问题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。

本书根据《胡适日记全集》的内在线索，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，并就上述引起议论的疑点，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，让胡适自己说话，还胡适一个原来面貌。

作者简介：

余英时 1930年生。美国哈佛大学史学博士。历任哈佛大学教授、香港新亚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、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。2001年，自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荣退。

■ 重寻胡适历程	余英时
□ 大历史不会萎缩	黄仁宇
□ 黄仁宇书信集	黄仁宇
□ 明代的漕运	黄仁宇
□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	孙隆基
□ 历史学家的经线	孙隆基
□ 多余的话	瞿秋白
□ 小说稗类	张大春
□ 黑暗的闸门	夏济安
□ 文心雕龙讲疏	王元化

策划：



三辉图书

责任编辑 / 曹凌志
 特约编辑 / 依 稀
 封面设计 / 林 涛
 版式设计 / 董子源

目 录

从《日记》看胡適的一生	1
一 留学时期(1910—1917)	3
二 “新文化运动”初期(1917—1926)	14
三 “大革命”时期(1926—1930)	19
四 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(1931—1937)	28
五 出使美国(1937—1946)	48
六 内战时期(1946—1949)	81
七 落日余晖(1949—1962)	100
后记	136

论学谈诗二十年

——序《胡適杨联陞往来书札》	144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

——《胡適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序	15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前言	157
一 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	163
二 思想革命的始点	169
三 长期的精神准备	173
四 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	178
五 胡适思想的形成	192
六 方法论的观点	197
七 实验主义的思想性格	202
八 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	209
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与史学革命	221
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	233
文艺复兴乎？启蒙运动乎？ ——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	242
征引书目	269

从《日记》看胡適的一生

联经出版公司重新编校的《胡適日记全集》是一部最完整也最合用的新版本。最完整，因为它以曹伯言先生整理的《胡適日记全编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1）为底本，又增加了一些以前未收的新数据；最合用，因为《胡適日记全集》四百万字，翻检不易，联经本附加一册人名索引，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最近一二十年来，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都已相继出版，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。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，《胡適日记全集》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，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。理由很简单，从1917年到1962年，胡適无论在文化史、思想史、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，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，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就与众不同。更难

得的是，他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、批判他甚至诋毁他的原始档，这尤其不是一般日记作者所能做得到的。所以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。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，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，不过具体而微罢了。

联经出版公司毅然决定出版这样一部庞大的日记，其原动力只能来自一种纯净的文化理想。因此刘国瑞、林载爵两先生提议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文时，我在“义不容辞”的直感下便一口答应了。现在开始着手写序，我却不免颇为踌躇，因为我不能决定采用什么方式把《胡适日记全集》的史料价值充分而又系统地呈现出来。二十一年前我为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（胡颂平编著，台北：联经，1983）写序时，除了《胡适留学日记》之外，其余部分尚未刊行。所以我只能从思想方面着眼，写成了一篇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，但其中很少谈到他个人的事迹。自1990年《胡适的日记》影印本（台北：远流）问世以来，它便成为我经常浏览和翻检的一部史料。在一切涉及20世纪文化、思想、政治动向之类的论著中，我往往先参考《日记》，一方面寻求整体背景的了解，一方面觅取具体证据。日积月累之余，《日记全集》逐渐引导我进入了胡适的世界，我在二十年前的一片空白今天总算勉强填补起来了。反复考虑之后，我最后决定根据《日记全集》的内在线索，把胡适的一生分成几个阶段，并分别点出其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。但在每一阶段，胡适个人的生命史上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，现在由于《日记全集》的出现，

其中有些问题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。我自然不能在这篇序文中讨论所有的疑点,因此下面仅择其较有关系者,予以澄清。我相信这也许是使读者认识《日记全集》的价值与意义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。

一 留学时期(1910—1917)

《胡适留学日记》刊布最早,流行也最广,所以不须多说。我在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》中,已详引《留学日记》,说明留美七年是他的“精神准备”时期。1917年6月他启程回国则象征了“准备”时期的终结,因为他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已发表在《新青年》1月号,揭开了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序幕。在这七年之内,中国学术思想界正处在低潮时期,不少人都在重新探索出路。陈独秀的《青年杂志》(后改为《新青年》)和章士钊的《甲寅杂志》都代表了这种探索的努力。胡适个人的“精神准备”和中国思想界的“新探索”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,这才造成了他“闭门造车”而竟能“出门合辙”的巧遇。

在这一阶段中,胡适生命史上有两个相关的疑点必须予以澄清:第一是博士学位问题,第二是他的哲学造诣问题。

关于博士学位的问题早在1919年便已出现了。朱经农1919年9月7日给胡适的信中说:

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。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“昔为好友,今为讎仇”的先生的胡说,大有“一犬吠形,百犬吠声”的神气,说“老胡冒充

博士”，说“老胡口试没有 pass”，“老胡这样那样”。我想“博士”不“博士”本没有关系，只是“冒充”两字决不能承受的。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，使你心中不快。但因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”，这种谣言甚为可恶，所以直言奉告，我兄也应设法“自卫”才是。凡是足下的朋友，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。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，现在“口众我寡”，辩不胜辩，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，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。〔1〕

“昔为好友，今为讎仇”即指梅光迪。这是当年“谣言”的起源，但朱经农显然知道关键全在胡适的博士论文没有印出来。1920年8月9日朱经农在致胡适函中附注又说：

又，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，此间对于这件事，闹的谣言不少，我真听厌了，请你早早刊布罢。〔2〕

胡适的论文终于在1922年刊出（见后），我想这也是一个原因。现在让我们根据《日记》，重考这一疑案。《留学日记》1917年5月27日追记“博士考试”条说：

五月二十二日，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。（中略）此次为口试，计二时半。吾之“初试”在前年十一月，凡笔试六时（二日），口试三时。七年留学生活，于此作一结束，故记之。

此记明言“考过”，本无可疑。胡颂平《年谱长编》在此条之后的“编者按”引唐德刚《胡适杂忆》说：

〔1〕 见梁锡华选注：《胡适秘藏书信选》续篇（台北：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，1982），页692。

〔2〕 同上，页695。

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(1915—1917)。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“规定住校年限”(required residence)都嫌不足,更谈不上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。……所以胡适以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。〔1〕

《年谱长编》的“编者按”接着说:

照《胡适杂忆》的话,似哥大不应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的。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乃是事实,若非唐君推断有错误,则是哥大办理博士学位授予的人有错误。(第一册,页285)

胡颂平先生为胡适辩护,自在情理之中,但唐德刚先生的怀疑是否有根据呢?胡适晚年在《口述自传》中,是这样回忆的:

我在1915年9月注册进哥大哲学系研究部。其后一共读了两年。在第一年中我便考过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。初试及格,我就可以写论文;我也就〔可以〕拿到我的〔哲学博士〕学位了。1917年的夏季,我就考过我论文最后口试。所以两年的时间——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尔研究院就读的两年,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了。〔2〕

这跟前引《留学日记》一条先后一致。《日记》说他在1915年11月——即入哥大两个月后——便考过“初试”,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。今据《口述自传》,则知他在康乃尔最后两年已修了足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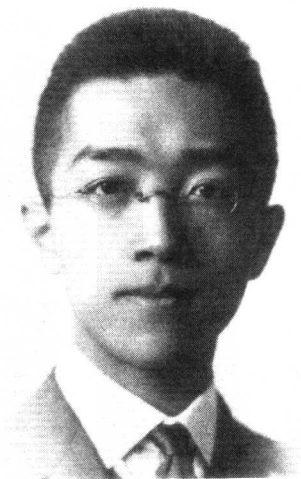
〔1〕唐德刚:《胡适杂忆》(台北:传记文学出版社,1979),页41—42。引文文字小异,已据原书校正。

〔2〕唐德刚译注:《胡适口述自传》(台北:传记文学出版社,1981),页85。

的哲学史和哲学课程，所以他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一共是四学年，并不自哥大始。但是胡适在康大毕业是 1914 年，为什么他说在康大读了两年研究院的课程呢？1914 年 2 月 17 日《记本校毕业式》条解答了这个疑团：

余虽于去年（按：1913 年）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课，惟以大学定例，须八学期之居留，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学位，今年夏季始与六月卒业者同行毕业式。（《留学日记》卷四）

原来他每年都上暑期学校，到 1913 年夏天已修足了毕业学分，只因限于校章的规定，延迟到 1914 年 2 月才正式取得学位。他最后两年多修研究院的哲学课程，是无可置疑的；《留学日记》中有很多条札记可以证明这一事实，读者不妨自行检阅。



1914 年胡适在美国

康乃尔哲学系当时以德国唯心论独步美国，胡适所师事

的克赖顿 (James Edwin Creighton)、哈蒙德 (W. A. Hammond)、梯利 (Frank Thilly)、阿尔比 (Ernst Albee) 等人都是望重一时的名家。^{〔1〕}胡适在康大的哲学训练已奠定了他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基础。由于他的思维方式自始便与黑格尔一派的路数不合,他早在 1914 年 1 月便露出了接近杜威一派的明显倾向; (《留学日记》,卷三,第三二、三四两条札记) 第二年 5 月他已成为“实效主义”(pragmatism) 的信徒(同上,卷九,第五二条)。所以他“在 1915 年的暑假中,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,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”。(《留学日记·自序》)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,胡适两年内在哥大完成“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”便丝毫不必诧异了。

但唐德刚在上引《口述自传》一段文字的注释中却又提出了另一相关的疑问,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的结果是“大修通过”(pass with major revision),而且必须“补考”,因此迟至 1927 年他重返哥大,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,才取得博士学位。我们都知道,哥大过去有一项规定,颁授博士学位必须在论文出版并缴呈一百本之后。因此在一般的理解中,这是胡适的学位比论文完成迟了十年的唯一原因。但唐先生的疑问也自有他的根据,他认为如果不是“大修通过”,“何必等到 1922 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,1927 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?”^{〔2〕}所以他推测这是因为杜威在华两年,亲见胡适在

〔1〕 参看萧公权:《问学谏往录》(台北:传记文学出版社,1972),第六章。

〔2〕 唐德刚译注:《胡适口述自传》,页 100。

“学术界的声势”，回到哥大后，运用他的“地位”，把“大修通过”改为“小修通过”(pass with minor revision)。这是一个“大胆的假设”，然而没有经过“小心的求证”。因此他感慨地说：“如果杜威遗札尚存，哥大纪录犹在，‘胡适学位问题’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。”〔1〕可见他并没有在“哥大纪录”或“杜威遗札”中发现任何硬证(hard evidence)，可以支持他的“假设”。唐先生似未见前引朱经农的信，但他的怀疑却与梅光迪不谋而合，甚为有趣。现在《胡适日记》出版了，我们可以试着解答他的疑问了。

胡适1917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“文学革命”，紧接着又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。在最初四五年中，他活动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简直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。我们只要一查1919—1920年《日程与日记》残本(《全编》本，第三册，页12—222)，便可见其一斑。这一段时期内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论文、拿学位证书的念头。那么他为什么终于在1922年出版了这篇论文呢？〔2〕除了与上引朱经农的信有关外，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动念，愿意应哥大之聘，去教一两年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。《日程与日记》1920年9月4日条记：

Greene(按：即顾临，Roger Greene)来信，托我为Columbia大学觅一中国文学教授，我实在想不出人来，遂决计荐举我自己。我实在想休息两年了。今天去吃饭，我把此意告他，他原

〔1〕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页102。

〔2〕*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*, By Hu Shih (Shanghai: Oriental Book Co.).

函本问我能否去，故极赞成我的去意。我去有几种益处：

(1) 可以整顿一番，(2) 可以自己著书，(3) 可以作英译哲学史，(4) 可以替我的文学史打一个稿子，(5) 可以替中国及北大做点鼓吹。

可知哥大原来托顾临探询他的意向，如果他不能去，则请他另推荐替人。他这时之所以有此想法，是因为三年来太忙了，自觉治学成绩下降，有改换环境的必要。他在 1921 年 7 月 8 日的《日记》中说：

去年我病中曾有《三年了》诗，只成前几节，第一节云：

三年了！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？

空惹得一身病，添了几岁年纪！

我想我这两年的成绩，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，真可惭愧！

明白了这个背景，我们便不会奇怪他何以忽动远游之念了。一年半以后，哥大的聘书果然来了。《日记》1922 年 2 月 23 日条：

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Nicholas Monroe Butler 正式写信来，聘我去大学教授两科，一为中国哲学，一为中国文学。年俸美金四千元。此事颇费踌躇。我已决定明年不教书，以全年著书。若去美国，《哲学史》中下卷必不能成，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学史罢了。拟辞不去。

这时他的心情改变，又犹豫不决了。但成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，这应该是他决定将论文付印的主要原因，一方面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，另一方面也可用于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。不但如此，

1923年6月他还有赴美参加教育会议的机会。《日记》1923年6月4日条)所以论文不迟不早,就在1922年出版,决不是偶然的。后来这两个远行计划都取消了,因此拖延到1926—1927年才有欧美之行。

1926年12月26日《日记》上有一句话:

发电给亚东,请他们寄《名学史》一百册到Dena处。

这当然是为了取得学位之故,所以这一百册论文直接寄给杜威。但《日记》中涉及博士学位的仅此一条,唐德刚先生认为“杜威遗札”可以解决胡适学位的问题,《日记》中恰好保存了杜威在1926年9月30日答胡适的一封长信(《日记》1926年10月9日条)。此信主要是答复胡适所提出的关于“比较哲学”的问题,其次则是一些互相问候的话,没有半个字提到胡适学位的事。如果真如唐先生所推测,杜威用了大力量使哥大松动它的“严格校规”,把胡适的论文从“大修”改为“小修”,那么这封信上至少会有一两句交代的话。彼此信中全不及此事,恐怕只能表示胡、杜两人心中根本就没有“学位”的问题。博士论文“口试”是“最容易的一道关”,这是唐先生也承认的。(页98)除非“哥大纪录”中有关于胡适从“大修”改“小修”的明确记载,我们实在很难想像考官中有谁故意和杜威过不去,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导的论文。更使人难解的是,哥大富路德教授(Luther C. Goodrich)是1927年的目击证人,他既出面说明胡适得学位迟了十年完全是由于“论文缓缴”之故,唐先生为什么不予采信呢?下面是唐先生的话:

夏(志清)、富(路德)二教授认为……别无他因,只是“论文缓缴了”就是了。富老先生在1927年已(是)哥大的中日文系